

## 目标引领增长

李书娟 徐现祥\*

**摘要** 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事实是, 中央通过增长目标领导随后的经济增长。基于此, 本文尝试考察目标引领经济增长的程度。在理论上, 本文贡献了一个识别目标引领增长程度的简洁方法。在实证上, 基于 2001—2013 年的中国地级市样本, 本文发现, 在经济上行时期, 目标对实际经济增长无显著影响; 在经济下行时期, 目标对经济增长的引领程度约为 1/3; 在 2001—2013 年间, 目标引领经济增长的程度大致不变, 保持在 1/3 左右。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 揭示了目标引领经济增长的程度及其条件。

**关键词** 增长目标, 经济增长, 地方官员

**DOI:** 10.13821/j.cnki.ceq.2021.05.04

### 一、引言

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事实是, 中央通过增长目标领导中国经济增长。<sup>1</sup>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八大, 历次党代会都明确提出经济增长翻番的目标。中央的增长目标通过五年规划、政府工作报告等转化为国家公开承诺的增长目标。国家的增长目标通过行政层级分解到各级地方政府, 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公开承诺的增长目标 (Li *et al.*, 2019)。地方政府在公布目标的同时, 明确部署工作重点, 力争实现目标。因此, 源于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实践的一个基本问题是, 期初的目标能够引领随后的增长吗? 如果能, 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引领? 目标的引领作用有多大?

基于此, 本文尝试定量估计期初的目标对随后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首先, 本文贡献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框架。假定中央分解到地方的增长目标为

\* 李书娟,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徐现祥,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通信作者及地址: 徐现祥, 广东省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510275; 电话: 13926189594; E-mail: lnsxuxx@mail.sysu.edu.cn。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20&ZD07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71673310、71773038、71903073)、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 (19C10559079) 及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018030310440) 的资助, 本文先后在清华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制度经济学论坛 (2018)、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联谊会 (2018) 报告, 与会同行对论文提出许多意见及建议, 在此表示感谢。当然, 文责自负。

<sup>1</sup> 现有文献已经观察到这种现象, 并称之为“层层加码” (周黎安等, 2015)、经济增长目标管理 (徐现祥和刘毓芸, 2017) 或目标治国 (马亮, 2017)。

$g_T$ , 当经济体不存在目标管理时, 市场能够实现的增长速度为  $g_M$ 。这时, 地方可能面临两种情形: 市场力量能够自发实现期初增长目标和不足以自发实现期初目标, 即  $g_T \leq g_M$  和  $g_T > g_M$  两种情况。前者意味着, 市场能够自发实现期初增长目标, 增长目标显然无任何实质性影响。后者则意味着, 地方需要进行经济增长管理才可能实现目标。这表明, 目标引领经济增长是有条件的。假定地方既要尽可能实现既定的增长目标, 又要尽可能保证市场引领的经济增长。前者意味着政治上的必要, 后者意味着经济上的可行。本文发现, 当  $g_T \leq g_M$  时, 增长目标对实际经济增长没有影响; 当  $g_T > g_M$  时, 最优经济增速是目标引领增长与市场引领增长的加权平均数。增长目标的权重  $\omega$  度量了其对随后经济增长的引领程度, 且  $0 < \omega < 1$ 。然后, 本文把增长目标引入标准的增长方程, 估计增长目标对实际经济增长的引领程度。

基于上述识别策略, 本文采用在 2001—2013 年间地级市的增长目标样本, 实证分析增长目标对经济的引领程度。采用上述识别策略需要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 如何度量增长目标。本文从各地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手工收集整理 283 个地级市的经济增长目标。二是, 如何度量地方官员的增长绩效。本文采用夜间灯光亮度度量经济绩效。其原因在于, 首先, 各地 GDP 增长目标是地方政府公布, GDP 增长速度也由地方政府统计和公布, 为了完成既定目标, 可能出现“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操纵数据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目标与实际 GDP 增长率存在自然而然相关的可能性。另外, 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 目标通过倒逼资源配置影响实际经济增长, 不适合在增长方程中控制投资等要素变量, 而现有文献恰好发现, 以夜间灯光亮度代理经济发展水平时, 在地级市层面存在显著的绝对趋同(王贤彬等, 2017)。本文采用夜间灯光亮度就是为了利用这一特征, 在回归中只需要控制期初夜间灯光亮度。三是, 如何划分市场力量能够自发实现期初增长目标和不足以自发实现期初增长目标两种情形。本文尝试利用经济周期把经济划分为上行时期和下行时期, 分别代理上述两种情形。当经济处于上行时期时, 市场力量更有可能自发实现期初增长目标, 预计  $\omega = 0$ 。当经济处于下行时期时, 市场力量不足以自发实现期初增长目标, 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由市场和目标共同驱动, 预计  $0 < \omega < 1$ 。解决上述三个问题后, 本文实证估计目标的引领程度。与理论的预期一致, 本文发现, 在 2001—2013 年间, 在经济上行时期, 期初目标对随后的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 在经济下行时期, 期初目标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对随后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 引领程度约为 1/3; 从变动趋势上看, 目标引领程度在 2001—2013 年间基本保持平稳。采用不同样本、不同指标度量增长目标和不同层面的经济周期划分后, 本文的基本发现依然稳健。

最后, 本文排除可能存在的两种竞争性解释。不可否认, 期初的目标与随后的经济增长速度正相关, 一种可能的竞争性解释是: 这是第三方因素, 即地方官员影响的结果。期初的增长目标是地方官员公开承诺的, 地方官员

基于政治激励或经济激励对地方经济绩效产生影响（徐现祥等，2007；张军和高远，2007；姚洋和张牧扬，2013）。这表明地方官员能够同时影响期初的增长目标和随后的经济增长。采用地方官员换届年样本，是排除上述可能的竞争性解释的一个合适的策略。因为，在官员更替年份，年初承诺增长目标的地方官员，与影响随后经济增长的地方官员不再相同，增长目标的影响和提出目标的地方官员的影响被分离。采用官员更替年份样本，本文发现期初的增长目标依然能够显著地引领随后的经济增长，引领程度也基本没变。可能存在的另一种竞争性解释是：这是由于目标是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测。也就是说，目标和实际经济增长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为了排除这一竞争性解释，本文根据 Li *et al.*（2019）关于增长目标在不同政府层级存在“层层加码”特征以及与辖区内行政单位数目负相关的两个发现，构造相应的工具变量，重现了本文的主要结果，发现本文的基本结论依然成立。

本文的工作属于正在兴起的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文献<sup>2</sup>，与 Li *et al.*（2019）及徐现祥和刘毓芸（2017）最为接近。前者从官员横向晋升激励及目标纵向激励的视角，考察经济增长目标对实际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深入分析了多层级政府最优目标设定的机制。后者从激励相容的角度，证明了在一定条件下利益兼容的增长目标管理有利于经济增长，其影响系数的取值应为  $\omega \geq 1$ 。<sup>3</sup> 本文则将增长目标管理与经济增长文献相结合，发现期初增长目标对随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因条件而异的。当市场力量能够自发实现期初目标时，目标无任何引领作用， $\omega = 0$ ；当市场力量不足以自发实现期初增长目标时，最优的经济增速是目标引领增长与市场引领增长的加权平均数，增长目标的权重  $\omega$  度量了其对随后经济增长的引领程度，且  $0 < \omega < 1$ 。本文采用 2001—2013 年中国地级市层面数据验证了本文的理论预期。

本文以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一个简单的理论框架，第三部分是样本描述，第四、五部分是实证分析，最后是结论性评述。

## 二、一个简单的理论框架

在中国，中央前瞻性地制定经济发展目标，并将这一目标分解到地方政

<sup>2</sup> 目前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文献主要关注三点：一是经济增长目标设定的影响因素（马亮，2013；余泳泽和杨晓章，2017），及其策略性调整（徐现祥和梁剑雄，2014）；二是经济增长目标的“层层加码”特征（周黎安等，2015；Li *et al.*，2019）；三是目标治国模式研究，强调目标是政府工作的“指挥棒”，政府通过设定和监督各项目标的完成，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马亮，2017），目标是激励、管理下级官员的重要手段，通过部门划分、逐级摊派和层层分解而得以贯彻落实，成为政府绩效评价与管理的主要抓手（王汉生和王一鸽，2009；魏四新和郭立宏，2011）。

<sup>3</sup> 实际上，徐现祥和刘毓芸（2017）利用全球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目标的回归系数部分是小于 1 的。

府, 引领中国经济增长。不妨假定, 中央分解到地方官员的增长目标为  $g_T$ <sup>4</sup>, 地方官员负责落实中央给定的这一增长目标。当经济体不存在目标管理时, 辖区市场引领的增长速度为  $g_M$ 。地方官员对其任期内的辖区经济增长速度  $g_t$  负责, 面临的问题可以表示为

$$\max_{g_t} \sum_{t=0}^T \{-(1-\omega)(g_t - g_M)^2 - \omega(g_t - g_T)^2\}, \quad (1)$$

其中,  $T > 0$  和  $0 \leq \omega < 1$  分别是地方官员的任期及其对增长目标的重视程度。在效用损失函数中,  $(g_t - g_T)$  度量对目标的差距, 差距越小在政治上越必要。 $(g_t - g_M)$  度量对市场引领增长的差距, 差距越小在经济上越可行。对于地方官员而言,  $g_T$  和  $g_M$  都是外生给定的, 由式 (1) 的一阶必要条件可得, 对于地方官员最优的增长速度为

$$g_t = \omega g_T + (1 - \omega) g_M. \quad (2)$$

不失一般性, 假定  $g_T \neq g_M$ 。此时, 经济体存在  $g_M > g_T$  和  $g_M < g_T$  两种情况, 具体讨论如下。

首先, 讨论  $g_M > g_T$  的情形。当  $g_M > g_T$  时, 经济体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经济增长速度大于经济增长目标。这意味着经济体的市场机制能够自动实现经济体的增长目标, 政府无需采取任何额外政策措施确保增长目标的实现。因此, 当  $g_M > g_T$  时, 增长目标对经济体的实际经济增长没有任何影响。此时经济体实现的经济增长等于市场机制实现的经济增长, 式 (2) 退化为  $g_t = g_M$ ,  $\omega = 0$ 。

其次, 讨论  $g_M < g_T$  的情形。当  $g_M < g_T$  时, 经济体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经济增速低于经济增长目标。由于政府对经济增长目标负责, 地方官员需要通过政策制定等措施对经济活动进行管理。式 (2) 揭示了, 在市场力量无法保证增长目标自发实现时, 对于地方官员最优的增长速度是目标引领增长与市场引领增长的加权平均数。显然, 此时地方官员越重视中央给定的增长目标, 即  $\omega$  越大, 地方官员最优的增长速度越接近中央给定的增长目标, 即  $g_t$  越接近  $g_T$ 。因此, 从这种意义上说, 当  $g_M < g_T$  时,  $\omega$  度量了期初的增长目标  $g_T$  对随后经济增长的引领程度。此时, 经济体实现的经济增长  $g_t = \omega g_T + (1 - \omega) g_M$ ,  $0 < \omega < 1$ 。

接着, 本文给出  $g_M$  的表达式。现有的经济增长理论, 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还是新增长理论, 都是在考察市场是如何引领经济增长的, 即在考察  $g_M$  的表达式。为了与现有实证经济增长文献保持一致 (Barro and Sala-i-Martin, 2004; Mankiw *et al.*, 1992; Islam, 1995), 本文把  $g_M$  表示为,

<sup>4</sup> 为了简化起见, 本文没有在理论上考察中央如何为地方设定增长目标, 只是假定其为外生给定。

$$g_M = -\beta \ln y_0 + XB + \epsilon. \quad (3)$$

在式(3)中,  $y_0$ 和 $X$ 分别是地方官员辖区的初始发展水平和影响稳态发展水平的控制变量向量。 $\beta$ 和 $B$ 是相应的回归系数和系数向量。

最后, 本文讨论目标引领经济增长的识别方程。把式(3)带入式(2), 可得本文的核心回归方程,

$$g_t = \omega g_T - \beta(1 - \omega) \ln y_0 + XB(1 - \omega) + \epsilon(1 - \omega). \quad (4)$$

式(4)是本文的核心回归方程, 将期初给定的增长目标 $g_T$ 引入了标准的实证经济增长方程。 $\omega$ 是本文关心的核心参数, 度量了期初的增长目标对随后经济增长的引领程度。

值得强调的是, 式(4)具有一般性。当 $g_M > g_T$ 时, 经济体能够依靠市场力量自发实现期初增长目标, 政府官员无需任何经济增长目标管理。因此, 预期 $\omega = 0$ , 式(4)将退化为式(3)。当 $g_M < g_T$ 时, 完全依靠市场力量无法实现上级分解的目标, 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由市场和目标共同驱动, 目标对实际经济增长的驱动程度为 $\omega$ , 预期 $0 < \omega < 1$ 。

以上分析表明, 本文所关心的核心参数 $\omega$ 能够识别期初目标对随后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在以下实证分析过程中, 本文将分两种情形估计核心参数 $\omega$ 。利用经济周期的上行期和下行期划分经济体存在的 $g_M > g_T$ 和 $g_M < g_T$ 情形: 当经济处于上行时期, 市场更有可能自发实现期初增长目标, 预计 $\omega = 0$ ; 当经济处于下行时期, 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由市场和目标共同驱动, 预计 $0 < \omega < 1$ 。

### 三、样 本

本文采用中国地级市样本实证分析期初目标对随后经济增长的引领程度。<sup>5</sup>经济增长目标来源于各地政府工作报告, 在2001—2013年间, 几乎所有地级市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明确了当年的增长目标。近年来, 在增长目标之前逐渐出现“约”“左右”等修饰语, 还有部分采取区间目标的表述形式。本文处理规则是, 以具体数字为准, 区间目标取其均值。<sup>6</sup>

根据增长目标数据的完整程度, 2001—2013年间283个地级市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增长目标数据完整无缺的地级市, 这样的样本是88个, 占31.1%; 第二类是增长目标数据全部缺失的地级市, 这样的样本是4个; 第三类是增长目标数据部分缺失的地级市, 这样的样本是191个, 占67.5%。

<sup>5</sup> 不包括直辖市。

<sup>6</sup> 比如铜陵市2007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述为“15%—17%”, 区间均值目标就为 $(15\% + 17\%) / 2 = 16\%$ 。

从地理分布上看,88个经济增长目标无缺失的地级市具有地域代表性,分布在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具体而言,主要分布在以下22个省市自治区:安徽省、福建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河北省、河南省、黑龙江省、湖北省、吉林省、江苏省、江西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山东省、山西省、陕西省、四川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浙江省。不论是东部、中部还是西部都有分布,显然,在地理分布上具有全国代表性。

从经济增长目标数值来看,88个无缺失的地级市也具有代表性,与其他城市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表1的Part A报告了全样本279个地级市、88个目标无缺失样本地级市及191个目标存在缺失地级市在增长目标方面的描述性统计。具体而言,全样本279个地级市的增长目标均值为0.124,即12.4个百分点,88个目标无缺失地级市的增长目标均值也是0.124,191个目标有缺失地级市的增长目标依旧是0.124。第5行第(10)列报告了88个地级市与191个地级市增长目标均值的差异,差异基本为0,且不显著。表1的Part B报告了划分经济上下行时全样本和88个目标无缺失地级市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不难看出,不论是上行时期还是下行时期,88个目标无缺失地级市在经济增长目标和夜间灯光增长率方面均没有显著差异。这一结果进一步说明,本文选取的88个目标无缺失地级市具有代表性。

另外,本文尝试利用经济周期把经济体划分为上行时期和下行时期,用来代理市场能够自发实现期初增长目标和无法自发实现期初增长目标的两种情形。这是因为,当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由市场和目标共同驱动时,尽管我们无法观察到市场自发实现的增长速度,但是经济周期具有反映市场能否自发实现期初增长目标的可能性。给定期初增长目标,当经济上行时,市场自发实现增长目标的可能性大些;当经济下行时,市场自发实现增长目标的可能性小些。本文采用常用的H-P滤波法、基于GDP来计算经济周期值(Hodrick and Prescott, 1997; 董进, 2006)。本文的主要结果采用 $\lambda = 100$ 计算地级市层面经济周期,根据周期值是否大于0生成经济上行( $up$ )及经济下行( $down$ )两个变量,当周期值大于0时, $up = 1$ ,否则为0;当周期值小于0时, $down = 1$ ,否则为0。

从统计结果来看,利用经济周期划分的上行时期和下行时期能够较好地代理市场能否自发实现期初增长目标的两种情形,经济上行时期比经济下行时期实现期初增长目标的可能性更大。从全样本279个地级市的统计结果来看,经济处于上行时期时有约76%的样本实现了年初的增长目标,经济下行时期只有54%的样本能够实现年初目标,二者的差异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的统计检验。从目标无缺失的88个地级市以及191个目标有缺失的地级市来

看，也得到同样结论。<sup>7</sup>

总之，不论是从经济增长目标数值的地区分布上，还是在划分经济周期的情况下，88 个目标无缺失城市与全样本 279 个城市都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将主要采用这 88 个地级市样本进行回归，其他地级市样本作为稳健性检验。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Part A: 不分经济上下行										
变量	全样本			88 个地级市			191 个地级市			
	(1)	(2)	(3)	(4)	(5)	(6)	(7)	(8)	(9)	(10)
	N	均值	标准误	N	均值	标准误	N	均值	标准误	(5)–(8)
经济周期值	3 666	0.007	0.036	1 144	0.008	0.033	2 522	0.007	0.037	0.001
经济上行变量	3 666	0.572	0.495	1 144	0.593	0.492	2 522	0.563	0.496	0.030
经济下行变量	3 666	0.428	0.495	1 144	0.407	0.492	2 522	0.437	0.496	-0.030
经济增长目标	2 963	0.124	0.028	1 144	0.124	0.001	1 819	0.124	0.001	0.000
夜间灯光增长率	2 963	0.075	0.063	1 144	0.065	0.002	2 483	0.079	0.002	-0.014
上期夜间灯光对数值	2 963	10.698	1.075	1 144	5.122	0.021	2 483	4.785	0.015	0.338

  

Part B: 划分经济上下行										
变量	上行时期					下行时期				
	全样本		88 个地级市			全样本		88 个地级市		
	(1)	(2)	(3)	(4)	(5)	(6)	(7)	(8)	(9)	(10)
	N	均值	N	均值	(4)–(2)	N	均值	N	均值	(9)–(7)
经济增长目标	1 776	0.129	678	0.129	0.000	1 187	0.117	466	0.118	0.001
夜间灯光增长率	1 776	0.086	678	0.078	-0.008	1 187	0.055	466	0.045	-0.010
上期夜间灯光对数值	1 776	10.723	678	11.215	0.492	1 187	10.319	466	10.861	0.542

注：(1) 经济周期为地级市层面周期，采用 H-P 滤波分析法确定（参数设定为 100）。(2) 经济增长目标数据来源于各地级市 2001—2013 年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夜间灯光数据来源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NOAA)；(3) Part A 第 (1)–(3) 列是全样本 279 个地级市的描述性统计；第 (4)–(6) 列是 88 个目标无缺失样本城市的描述性统计；第 (7)–(9) 列是 191 个目标有缺失样本城市的描述性统计；第 (10) 列是 88 个地级市与 191 个地级市的均值差异，即 (10) = (5)–(8)。(4) Part B 第 (1)–(5) 列的是全样本 279 个地级市分上下行的描述性统计及上下行时期的均值差异；第 (6)–(10) 列是 88 个目标无缺失的地级市分上下行的描述性统计及上下行时期的均值差异；没有报告标准误。(5)\*、\*\*和\*\*\*分别表示通过显著水平为 10%、5%和 1%的统计检验。

<sup>7</sup> 以不同  $\lambda$  参数及省级、国家级层面计算的经济周期也得到了同样结论。

## 四、实证结果

### (一) 基本结果

与式(4)预期的一致,在2001—2013年间,当经济下行时,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由市场和目标共同驱动,目标对实际经济增长的驱动程度 $\omega=0.335$ ;当经济上行时,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由市场驱动,目标对实际经济增长的驱动程度 $\omega=0$ 。

表2报告了本文的基本回归结果。为了检验本文采用88个目标无缺失地级市样本的合理性,首先再现现有实证经济增长文献的发现,第(1)列没有加入经济增长目标变量,只引入期初夜间灯光亮度进行回归。期初夜间灯光亮度的回归系数为 $-0.114$ ,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的统计检验,与现有经济增长文献的实证发现一致。这表明,本文采用88个目标无缺失地级市样本能够再现现有文献的发现。

第(2)列报告了经济上行样本的回归结果,增长目标的回归系数为 $0.065$ ,但是不显著。这与理论预期一致,在经济上行时期,增长目标对实际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第(3)列报告了经济下行样本的回归结果,增长目标的回归系数为 $0.335$ ,通过显著性水平为5%的统计检验。这也与理论预期一致,在经济下行时期,增长目标对实际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引领作用。第(2)、(3)列回归中期初夜间灯光亮度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也与现有经济增长文献的实证发现一致。上述结果表明,在经济上行时期,增长目标对实际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在经济下行时期,增长目标对实际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引领作用,引领增长的程度约为 $1/3$ 。

表2 基本结果

		夜间灯光亮度增长率						
被解释变量	目标完整样本(88个地级市)			全部地级市 样本(279 个地级市)	目标有缺失 样本(191 个地级市)	至少有五年 目标数据的 样本(265 个地级市)	全部地级 市样本 (279个 地级市)	
	经济上行 (1)	经济下行 (2)	经济下行 (3)	虚拟变量 (4)	虚拟变量 (5)	虚拟变量 (6)	虚拟变量 (7)	虚拟变量 (8)
$target_{it}$		0.065 (0.124)	0.335** (0.150)					
$target_{it} \times down_{it}$				0.224*** (0.064)	0.261** (0.127)	0.264*** (0.101)	0.327*** (0.068)	0.341*** (0.069)



(续表)

被解释变量	夜间灯光亮度增长率							
	目标完整样本 (88 个地级市)			全部地级市 样本 (279 个地级市)	目标有缺失 样本 (191 个地级市)	至少有五年 目标数据的 样本 (265 个地级市)	全部地级 市样本 (279 个 地级市)	
	经济上行	经济下行	虚拟变量	虚拟变量	虚拟变量	虚拟变量	虚拟变量	
(1)	(2)	(3)	(4)	(5)	(6)	(7)	(8)	
$target_{it} \times up_{it}$			0.030 (0.098)	0.270 (0.182)	0.032 (0.152)	0.113 (0.113)	0.151 (0.113)	
$down_{it}$			-0.011 (0.010)	0.011 (0.016)	-0.014 (0.016)	-0.012 (0.010)	-0.009 (0.011)	
$\log(light_{i,t-1})$	-0.114*** (0.031)	-0.131*** (0.036)	-0.080*** (0.028)	-0.083*** (0.014)	-0.116*** (0.029)	-0.107*** (0.024)	-0.098*** (0.017)	-0.090*** (0.015)
年份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城市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目标缺失市×年份							有	
R <sup>2</sup>	0.300	0.329	0.290	0.469	0.311	0.547	0.584	0.424
样本量	1 144	678	466	2 963	1 144	1 819	2 921	2 963

注：(1) 被解释变量为夜间灯光亮度增长率， $target_{it}$  为关键变量，为当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目标； $down_{it}$  及  $up_{it}$  为经济周期变量，当经济处于下行周期时， $down_{it} = 1$ ，否则为 0；当经济处于上行周期时， $up_{it} = 1$ ，否则为 0。(2) 控制变量有上一期夜间灯光亮度对数值、年份固定效应及城市固定效应。(3) 没有报告常数项；括号内为 cluster 在地级层面的标准误；\*、\*\*和\*\*\* 分别表示通过显著水平为 10%、5%和 1%的统计检验。

第 (4) 列报告了采用虚拟变量形式表示经济周期的回归结果。目标与经济下行虚拟变量交乘项的回归系数为 0.224，通过显著性水平 1%的统计检验。目标与经济上行虚拟变量交乘项的回归系数为 0.030，但是不显著。这与第 (2)、(3) 列的结果保持一致。

第 (5) 列报告了全部 279 个地级市样本、采用虚拟变量表示经济周期的回归结果。<sup>8</sup> 目标与经济下行虚拟变量交乘项的回归系数为 0.261，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5%的统计检验。目标与经济上行虚拟变量交乘项的回归系数为 0.270，但是不显著。这与采用 88 个地级市样本的回归结果相比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第 (6) 列报告了目标存在缺失的 191 个地级市样本的回归结果。目标与

<sup>8</sup> 限于篇幅，只报告了采用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没有报告分经济上下行样本的结果，二者的结论保持了一致。

经济下行虚拟变量交乘项的回归系数为 0.264, 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1% 的统计检验。目标与经济上行虚拟变量交乘项的回归系数为 0.032, 仍然不显著。

第(7)列报告了至少有 5 年目标数据的 265 个地级市样本的回归结果。目标与经济下行虚拟变量交乘项的回归系数为 0.327, 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1% 的统计检验。目标与经济上行虚拟变量交乘项的回归系数为 0.113, 仍然不显著。

第(8)列报告了控制“目标缺失市×年份”的回归结果。<sup>9</sup>考虑到目标数据缺失可能会给回归结果带来影响, 我们在第(5)列全样本控制年份固定效应和城市固定效应的基础上, 增加控制“目标缺失市×年份”, 采用全样本重新进行回归。增长目标与经济下行虚拟变量交乘项的回归系数为 0.341, 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1% 的统计检验, 与经济上行虚拟变量交乘项的回归系数依然不显著。这一结果与第(4)列相比, 无论是大小还是显著性都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总而言之, 以上结果表明, 2001—2013 年间, 在经济上行时期, 增长目标对实际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 在经济下行时期, 增长目标对实际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引领作用, 引领增长的程度约为 1/3。不论采用目标数据无缺失样本, 还是采用存在缺失的样本, 本文的基本结果都存在。

## (二) 稳健性检验: 采用不同的数据度量

本小节将从经济增长目标的不同度量、不同层面的经济周期角度, 检验上述基本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采用上、下限度量经济增长目标, 本文的发现依然成立。近年来, 少部分城市政府对增长目标的表述发生了变化, 由以往准确的数字目标变成了“区间目标”。为了避免度量误差, 本小节将对区间目标分别以目标上限值与目标下限值度量增长目标, 对基本结果进行重现。<sup>10</sup>表 3 第(1)—(3)列报告了以目标上限值度量区间目标的实证结果。第(1)列报告了采用经济上行时期样本的回归结果, 增长目标的回归系数为 0.065, 不显著。第(2)列报告了采用经济下行时期样本的回归结果, 增长目标的系数为 0.377, 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5% 的统计检验。第(3)列报告了采用虚拟变量表示经济周期的回归结果, 经济下行周期与增长目标交乘项的回归系数为 0.259, 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5% 的统计检验, 经济上行周期与增长目标交乘项的回归系数则不显著。这一结果与表 2 的基本结果保持了一致。表 3 第(4)—(6)报告了以目标下限值度量区间目标的实证结果。这一回归结果不仅与表 2 第(3)列采用区间目

<sup>9</sup> 感谢审稿人的建议。

<sup>10</sup> 仍然以安徽省铜陵市为例。当以目标上限值度量增长目标时, 铜陵市 2007 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取值 17%; 当以目标下限值度量增长目标时, 铜陵市 2007 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取值 15%。

标均值的回归结果保持一致，也与表 3 第 (1) 列采用目标上限值时的回归结果基本相同。这说明，不论采用目标上限值度量增长目标，还是采用目标下限值进行度量，本文的基本结果依然存在。

表 3 增长目标的其他度量

被解释变量	夜间灯光亮度增长率					
	目标上限值			目标下限值		
	经济上行	经济下行	虚拟变量	经济上行	经济下行	虚拟变量
(1)	(2)	(3)	(4)	(5)	(6)	
$target_{it}$	0.065 (0.124)	0.377** (0.147)		0.065 (0.124)	0.391** (0.153)	
$target_{it} \times down_{it}$			0.259** (0.127)			0.262** (0.127)
$target_{it} \times up_{it}$			0.264 (0.181)			0.276 (0.182)
$down_{it}$			0.011 (0.016)			0.012 (0.016)
$\log(light_{i,t-1})$	-0.131*** (0.036)	-0.080*** (0.028)	-0.116*** (0.029)	-0.131*** (0.036)	-0.079*** (0.028)	-0.116*** (0.029)
年份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城市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R^2$	0.329	0.290	0.311	0.329	0.291	0.311
样本量	678	466	1 144	678	466	1 144

注：(1) 被解释变量为夜间灯光亮度增长率， $target_{it}$  为关键变量，为当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目标； $down_{it}$  及  $up_{it}$  为经济周期变量，当经济处于下行周期时， $down_{it} = 1$ ，否则为 0；当经济处于上行周期时， $up_{it} = 1$ ，否则为 0。(2) 控制变量有上一期夜间灯光亮度对数值、年份固定效应及城市固定效应。(3) 没有报告常数项；括号内为 cluster 在地级层面的标准误；\*、\*\*和\*\*\* 分别表示通过显著水平为 10%、5%和 1%的统计检验。

采用不同层面的经济周期，本文的发现依然成立。基本回归采用的地级层面经济周期，本小节将分别采用省级层面以及国家层面的经济周期，检验基本结果的稳健性。表 4 第 (1)–(3) 列报告了采用省级层面经济周期的回归结果。第 (1) 列采用经济上行样本时，增长目标的回归系数为 0.070，不显著。第 (2) 列采用经济下行样本时，增长目标的回归系数为 0.660，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1%的统计检验，系数大小与采用地级经济周期相比稍微变大。第 (3) 列采用虚拟变量形式表示经济周期，与经济上行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

不显著, 与经济下行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为 0.460, 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1% 的统计检验。这一结果与采用地级经济周期的回归结果相比, 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第 (4)—(6) 列报告了采用国家周期的回归结果, 仍然与采用地级周期的结果保持了一致。这说明, 不论采用省级层面的经济周期, 还是国家层面的经济周期, 本文的基本结果仍然存在。

表 4 不同层面的经济周期

被解释变量	夜间灯光亮度增长率					
	省级经济周期			国家经济周期		
	经济上行	经济下行	虚拟变量	经济上行	经济下行	虚拟变量
(1)	(2)	(3)	(4)	(5)	(6)	
$target_{it}$	0.070 (0.186)	0.660*** (0.110)		0.234 (0.203)	0.401** (0.166)	
$target_{it} \times down_{it}$			0.460*** (0.128)			0.525*** (0.137)
$target_{it} \times up_{it}$			0.236 (0.214)			0.233 (0.201)
$down_{it}$			-0.026 (0.018)			0.101*** (0.024)
$\log(light_{i,t-1})$	-0.190*** (0.060)	-0.065*** (0.021)	-0.136*** (0.030)	-0.193*** (0.053)	-0.263*** (0.031)	-0.137*** (0.029)
年份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城市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R^2$	0.404	0.253	0.382	0.417	0.279	0.383
样本量	664	480	1 144	704	440	1 144

注: (1) 被解释变量为夜间灯光亮度增长率,  $target_{it}$  为关键变量, 为当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目标;  $down_{it}$  及  $up_{it}$  为经济周期变量, 当经济处于下行周期时,  $down_{it} = 1$ , 否则为 0; 当经济处于上行周期时,  $up_{it} = 1$ , 否则为 0。(2) 控制变量有上一期夜间灯光亮度对数值、年份固定效应及城市固定效应。(3) 没有报告常数项; 括号内为 cluster 在地级层面的标准误; \*、\*\*和\*\*\* 分别表示通过显著水平为 10%、5% 和 1% 的统计检验。

### (三) 目标引领的变化趋势

从十二大明确提出经济翻番目标直至十八大, 中央一直强调确保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总体而言, 2001—2013 年间, 目标对实际经济增长的引领作用保持稳定。基于本文数据的时间跨度为 2001—2013 年, 本小节首先构造了

三个时间段的虚拟变量：“*period* (2001—2005)”、“*period* (2006—2010)”和“*period* (2011—2013)”。具体地，当年份为 2001、2002、2003、2004 和 2005 年时，“*period* (2001—2005)”虚拟变量取值为 1，否则为 0。“*period* (2006—2010)”和“*period* (2011—2013)”的构造以此类推。然后再回归中加入上述虚拟变量与增长目标以及上下行虚拟变量的交互项，考察在不同时期增长目标对实际经济增长的引领程度。

表 5 第 (1) 列报告了采用 88 个地级市样本、考虑三个不同时期的回归结果，2001—2013 年间，增长目标对实际经济增长的引领程度仍然在 1/3 左右。第 (1) 列将三个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同时放入进行回归，此时，经济下行时期“2001—2005”时期的回归系数为 0.370，略高于 1/3，通过显著性水平 1% 的统计检验；“2006—2010”时期的回归系数为 0.285，略低于 1/3，通过显著性水平 1% 的统计检验；“2011—2013”时期的回归系数为 0.321，接近 1/3，也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1% 的统计检验。经济上行时期与各个时段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则全部不显著。

表 5 目标引领的变化趋势

	88 地级市样本	279 地级市样本
	(1)	(2)
$target_{it} \times down_{it} \times period(2001-2005)$	0.370*** (0.084)	0.295*** (0.104)
$target_{it} \times down_{it} \times period(2006-2010)$	0.285*** (0.104)	0.313*** (0.065)
$target_{it} \times down_{it} \times period(2011-2013)$	0.321*** (0.114)	0.344*** (0.082)
$target_{it} \times up_{it} \times period(2001-2005)$	0.018 (0.139)	0.071 (0.127)
$target_{it} \times up_{it} \times period(2006-2010)$	0.249 (0.179)	0.145 (0.089)
$target_{it} \times up_{it} \times period(2011-2013)$	0.351 (0.232)	0.195 (0.123)
$\log(light_{i,t-1})$	-0.073*** (0.013)	-0.089*** (0.013)
年份固定效应	有	有
城市固定效应	有	有

(续表)

	88 地级市样本	279 地级市样本
	(1)	(2)
$R^2$	0.484	0.588
样本量	1 144	2 963

注：(1) 被解释变量为夜间灯光亮度增长率， $target_{it}$  为关键变量，为当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目标； $down_{it}$  及  $up_{it}$  为经济周期变量，当经济处于下行周期时， $down_{it} = 1$ ，否则为 0；当经济处于上行周期时， $up_{it} = 1$ ，否则为 0。(2) 控制变量有上一期夜间灯光亮度对数值、年份固定效应及城市固定效应。(3) 没有报告常数项；括号内为 cluster 在地级层面的标准误；\*、\*\*和\*\*\* 分别表示通过显著水平为 10%、5% 和 1% 的统计检验。

表 5 第 (2) 列报告了采用全样本 279 个地级市样本的回归结果。与 88 个地级市样本的回归结果一致，总体而言，在经济下行时期，目标对经济增长的引领程度也稳定在 1/3 左右。

以上结果表明，总体而言，2001—2013 年间，在经济上行时期，增长目标对实际经济增长没有影响；在经济下行时期，经济增长目标对实际经济增长的引领作用没有明显的时间趋势，引领程度大致保持在 1/3 左右。

## 五、排除竞争性解释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发现事前的增长目标与事后的增长速度正相关。不可否认，这一结果还存在两种竞争性解释：一是地方官员影响的结果；二是因为目标是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测。本部分将从以下方面排除这两个竞争性解释：一是，采用地方官员更替年份样本排除地方官员影响的解释；二是，采用工具变量回归排除目标是对未来经济增长预测的解释。

### (一) 排除官员本身的影响

现有官员治理文献认为，地方官员能够显著促进辖区经济发展（徐现祥等，2007；张军和高远，2007；姚洋和张牧扬，2013）。增长目标是地方官员公开承诺的，地方官员会基于政治激励或经济激励去实现这一目标。因此，地方官员可能是影响期初目标和随后经济增长的第三方因素。

官员更替现象为分离增长目标与地方官员的影响提供了合适的样本。<sup>11</sup> 本文收集整理了中国 2001—2013 年各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市长简历，统计了市委书记、市长的更替信息。当地方官员发生更替时，公布经济增长目标的领导在目标期内离任，而新接任的领导尽管没有直接参与经济增长目标的制定

<sup>11</sup> 徐现祥等（2018）也有类似思路，在回归中加入了官员更替变量，考察省级官员变动是否改变增长目标对经济发展质量侵蚀影响程度。

与公布，却成为目标的实际负责人。此时，地方官员不再是同时影响期初目标和随后增长的第三方因素。

表 6 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官员更替年份，期初的目标对随后的经济增长依然存在显著的引领作用，并且大小依然约为 1/3。表 6 第 (1)、(2) 列分别报告了市委书记、市长更替年份的检验结果。不论是市委书记更替年份还是市长更替年份，目标对实际经济增长保持了约 1/3 的引领程度，与表 2 的基准回归结果相比，不论显著性还是回归系数大小都没有实质性变化。第 (3)、(4) 列分别报告了不区分书记或市长的更替年份及书记和市长同时更替年份的回归结果，目标的回归系数大小与基本结果相比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并且都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1% 的统计检验。上述结果与徐现祥等 (2018) 保持一致。

以上结果表明，期初的目标能够引领随后的经济增长，并不源于地方官员对期初目标和随后增长的同时影响。

表 6 排除地方官员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夜间灯光亮度增长率			
	书记更替年份 (1)	市长更替年份 (2)	书记/市长更替年份 (3)	书记、市长同时 更替年份 (4)
$target_{it} \times down_{it}$	0.372*** (0.091)	0.401*** (0.105)	0.339*** (0.074)	0.414*** (0.098)
$target_{it} \times up_{it}$	0.148 (0.137)	0.171 (0.162)	0.136 (0.117)	-0.087 (0.194)
$down_{it}$	-0.014 (0.017)	-0.017 (0.018)	-0.009 (0.015)	-0.048** (0.025)
$\log(light_{i,t-1})$	-0.061*** (0.018)	-0.097*** (0.019)	-0.079*** (0.015)	-0.032 (0.022)
年份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城市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R^2$	0.562	0.549	0.583	0.586
样本量	813	915	1 220	508

注：(1) 被解释变量为夜间灯光亮度增长率， $target_{it}$  为关键变量，为当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目标； $down_{it}$  及  $up_{it}$  为经济周期变量，当经济处于下行周期时， $down_{it} = 1$ ，否则为 0；当经济处于上行周期时， $up_{it} = 1$ ，否则为 0。(2) 控制变量有上一期夜间灯光亮度对数值、年份固定效应及城市固定效应。(3) 没有报告常数项；括号内为 cluster 在地级层面的标准误；\*、\*\*和\*\*\* 分别表示通过显著水平为 10%、5%和 1%的统计检验。

## (二) 排除目标是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测

对于目标与实际增速正相关,可能存在的另一种竞争性解释是:这是由于目标是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测。这意味着目标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反向因果关系,二者自然正相关。为此,本文根据 Li *et al.* (2019) 关于增长目标在不同政府层级存在“层层加码”特征以及与辖区内行政单位数目负相关的两个发现,构造相应的工具变量,重现本文的主要结果。具体而言,本文选择省级增长目标及中央增长目标乘以省内地级市数目两个指标作为地级增长目标的工具变量。如果工具变量回归表明本文的基本结果依然存在,则排除了目标是未来经济增长预测的竞争性解释。

表7 Part A 部分报告了采用经济上行样本时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上行时期增长目标对实际经济增长无影响。第(1)–(3)列报告了以省级增长目标作为工具变量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第(1)列以省级目标作为地级目标的工具变量时,增长目标的回归系数为0.053,不显著。第(2)列和第(3)列分别报告了以目标上限值、目标下限值度量增长目标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增长目标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52和0.054,同样不显著。上述结果表明,以省级增长目标作为地级增长目标的工具变量时,本文的基本结果依然成立,上行时期增长目标对实际经济增长无影响。

表7 排除目标是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测

被解释变量	夜间灯光亮度增长率					
	Part A: 上行时期					
	IV1: 省级经济增长目标			IV2: 中央经济增长目标 × 省内地级市数目		
	目标均值	目标上限值	目标下限值	目标均值	目标上限值	目标下限值
	(1)	(2)	(3)	(4)	(5)	(6)
$target_{it}$	0.053	0.052	0.054	2.161	2.160	2.162
	(0.299)	(0.298)	(0.297)	(2.006)	(2.005)	(2.004)
$\log(light_{i,t-1})$	-0.109***	-0.109***	-0.109***	-0.198***	-0.198***	-0.198***
	(0.014)	(0.014)	(0.014)	(0.029)	(0.029)	(0.029)
年份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城市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R^2$	0.616	0.616	0.616	0.461	0.461	0.461
样本量	678	678	678	678	678	678



(续表)

被解释变量	夜间灯光亮度增长率					
	Part B: 下行时期					
	IV1: 省级经济增长目标			IV2: 中央经济增长目标×省内地级市数目		
	目标均值	目标上限值	目标下限值	目标均值	目标上限值	目标下限值
	(1)	(2)	(3)	(4)	(5)	(6)
$target_{it}$	0.818*** (0.298)	0.818*** (0.299)	0.817*** (0.298)	0.619** (0.248)	0.620** (0.248)	0.618** (0.247)
$\log(light_{i,t-1})$	-0.080*** (0.021)	-0.081*** (0.021)	-0.079*** (0.021)	-0.018 (0.022)	-0.086*** (0.019)	-0.085*** (0.019)
年份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城市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R^2$	0.439	0.437	0.440	0.224	0.215	0.215
样本量	466	466	466	466	466	466

注：(1) 被解释变量为夜间灯光亮度增长率， $target_{it}$  为关键变量，为当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目标； $down_{it}$  及  $up_{it}$  为经济周期变量，当经济处于下行周期时， $down_{it} = 1$ ，否则为 0；当经济处于上行周期时， $up_{it} = 1$ ，否则为 0。(2) 控制变量有上一期夜间灯光亮度对数值、年份固定效应及城市固定效应。(3) 没有报告常数项；括号内为 cluster 在地级层面的标准误；\*、\*\*和\*\*\* 分别表示通过显著水平为 10%、5% 和 1% 的统计检验。

表 7 Part A 的第 (4)—(6) 列报告了采用经济上行时期样本、以中央增长目标乘以省内地级市数目作为工具变量的检验结果。无论以区间均值度量地级经济增长目标，还是以目标上限值或者下限值度量增长目标，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都表明本文的基本结果依然存在。

表 7 Part B 部分报告了采用经济下行样本时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第 (1)—(3) 列报告了以省级增长目标作为工具变量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第 (1) 列以省级目标作为地级增长目标的工具变量时，增长目标的回归系数为 0.818，与表 2 的基准回归结果相比，系数变大，但仍然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1% 的统计检验。第 (2) 列报告了以目标上限值作为增长目标度量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增长目标的回归系数仍然为 0.818，也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1% 的统计检验。第 (3) 列以目标下限值度量增长目标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增长目标的回归系数为 0.817，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1% 的统计检验。这说明，以省级增长目标作为地级增长目标的工具变量时，本文的基本结果依然存在，排除了目标是未来经济增长预测的竞争性解释。

表 7 Part B 的第 (4)—(6) 列报告了采用经济下行样本、以中央增长目

标乘以省内地级市数目作为工具变量的检验结果。<sup>12</sup>第(4)列经济增长目标的回归系数为0.619,比基本结果系数略微变大,通过显著性水平为5%的统计检验。第(5)列报告了以目标上限值作为增长目标度量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增长目标的回归系数仍然为0.620,也通过显著性水平为5%的统计检验。第(6)列以目标下限值度量增长目标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增长目标的回归系数为0.618,通过显著性水平为5%的统计检验。这说明,以中央增长目标乘以省内地级市数目作为地级增长目标的工具变量时,本文的基本结果依然成立,下行时期增长目标对实际经济增长仍然有显著的引领作用,排除了目标是未来经济增长预测的竞争性解释。

总而言之,不论采用省级增长目标,还是中央增长目标乘省内地级市数目作为地级增长目标的工具变量,本文的基本结果依然存在,这排除了目标是未来经济增长预测的竞争性解释。

## 六、结论性评述

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中央通过增长目标领导经济增长。国家的增长目标通过行政层级分解到各级地方政府,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公开承诺的增长目标,也是其动员一切资源发展经济的实施纲领。基于此,本文尝试定量分析目标引领经济增长的程度。

在理论上,本文证明了,当市场力量能够自发实现期初增长目标时,增长目标显然无任何实质性影响。当市场力量不足以自发实现期初增长目标时,地方官员既要尽可能实现既定的增长目标,又要尽可能保证市场引领的经济增长,其最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目标引领增长与市场引领增长的加权平均数。增长目标的权重 $\omega$ 度量了其对随后经济增长的引领程度,且 $0 < \omega < 1$ 。这表明,目标引领经济增长是有条件的。

在实证上,本文采用地级城市样本发现:在经济上行时期,目标对实际经济增长无显著影响;在经济下行时期,目标对经济增长的引领程度约为1/3;2001—2013年目标引领程度没有明显的时间趋势,保持在1/3左右。本文还排除了可能存在的两种竞争性解释:利用官员更替样本排除了是第三方因素官员影响的解释;利用工具变量回归排除了目标是对未来经济增长预测的解释。在采用不同样本、不同增长目标度量等检验后,本文的发现依然稳健。

本文的实证发现与理论预期是一致的,揭示了目标引领增长的程度。目标引领增长的微观机制是什么?这有待进一步研究。党的十九大强调,把

<sup>12</sup> Part B部分第(4)列采用省级增长目标及中央增长目标乘以省内地级市数目工具变量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与Li *et al.* (2019)一致。在采用均值度量增长目标时,采用省级增长目标及中央增长目标乘以省内地级市数目工具变量的第一阶段回归中的系数分别为0.832和-0.088,分别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和10%的统计检验。篇幅所限,没有报告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中的第一条，提出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如何实现目标引领高质量发展？这值得系统性研究。

## 参考文献

- [1] Barro, R., and X. Sala-i-Martin,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McGraw-Hill, 2004.
- [2] 董进, “宏观经济波动周期的测度”, 《经济研究》, 2006年第7期, 第41—48页。
- [3] Hodrick, R. J., and E. C. Prescott, “Postwar US Business Cycle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1997, 29 (1), 1-16.
- [4] Islam, N., “Growth Empirics: A Panel Data Approac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 110 (4), 1127-1170.
- [5] Li, X., C. Liu, X. Weng, and L. A. Zhou, “Target Setting in Tournament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China”, *The Economic Journal*, 2019, 129 (623), 2888-2915.
- [6] 马亮, “官员晋升激励与政府绩效目标设置——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 《公共管理学报》, 2013年第2期, 第28—39页。
- [7] 马亮, “目标治国、绩效差距与政府行为: 研究述评与理论展望”,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17年第6期, 第77—91页。
- [8] Mankiw, N. G., D. Romer, and D. N. Weil, “A Contribution to the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2, 107 (2), 407-437.
- [9] 王汉生、王一鹤, “目标管理责任制: 农村基层政权的实践逻辑”, 《社会学研究》, 2009年第2期, 第61—92页。
- [10] 王贤彬、黄亮雄、徐现祥、李郇, “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动态趋势重估——基于卫星灯光数据的考察”, 《经济学》(季刊), 2017年第16卷第3期, 第877—896页。
- [11] 魏四新、郭立宏, “我国地方政府绩效目标设置的研究——基于目标设置理论视角”, 《中国软科学》, 2011年第2期, 第8—15页。
- [12] 徐现祥、梁剑雄, “经济增长目标的策略性调整”, 《经济研究》, 2014年第1期, 第27—40页。
- [13] 徐现祥、刘毓芸, “经济增长目标管理”, 《经济研究》, 2017年第7期, 第18—33页。
- [14] 徐现祥、王贤彬、舒元, “地方官员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长、省委书记交流的证据”, 《经济研究》, 2007年第9期, 第18—31页。
- [15] 余泳泽、杨晓章, “官员任期、官员特征与经济增长目标制定——来自230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经济学动态》, 2017年第2期, 第51—65页。
- [16] 姚洋、张牧扬, “官员绩效与晋升锦标赛——来自城市数据的证据”, 《经济研究》, 2013年第1期, 第137—150页。
- [17] 张军、高远, “官员任期、异地交流与经济增长——来自省级经验的证据”, 《经济研究》, 2007年第11期, 第91—103页。
- [18] 周黎安、刘冲、厉行、翁翕, “‘层层加码’与官员激励”, 《世界经济文汇》, 2015年第2期, 第1—15页。

## Target Drives Growth

SHUJUAN LI

(*Jinan University*)

XIANXIANG XU\*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Based on the fact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that the party leads China's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growth targets, we attempt to inspect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target leads growth. Theoretically, our research developed a concise approach to identify the extent to which growth leads. Empirically, we use the sample of China's prefecture-level cities between 2001 and 2013, and find that during the economic upswing, the target had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actual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economic downturn, the target led 1/3 economic growth; In 2001—2013, there was no obvious time trend for the target to lead the actual economic growth, and it remained at around 1/3. These findings are robust and reveal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party leads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growth targets and the situation that targets works.

**Keywords** growth target, economic growth, local leader

**JEL Classification** O43, E61, H70

---

\* Corresponding Author: Xianxiang Xu, No. 135 Xingangxi Rd., Lingnan (University) Colleg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China; Tel: 86-13926189594; E-mail: lnsxuxx@mail.sysu.edu.cn.